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林其銓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

赵红英 宁一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林其銓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

赵红英 宁一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也是考察和分析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最主要的依据和参考。

几百年来,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长足发展,数量大大增加,分布更为广泛,功能日趋多元,组织更加复合多样,并随着时代发展展现新的活力。本书立足历史与现实,对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因缘成链,落地成团,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过程及其功能变化特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作了探索,力图展示多如繁星的五缘性社团众生态。五缘文化学说为从华侨华人群体结社的主观情结角度提供了观察的视角,以此将能更为清楚地了解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和现状,进而展望其发展前景。

五缘文化为守望互助层次的华侨华人社团提供了组建形成的黏合剂,为争取平权层次的华侨华人社团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催化剂,为融入主流层次的华侨华人社团提供了沟通和谐的融合剂。而作为五缘文化载体的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多元再到融入和谐,展望未来,必将在弘扬文化、促进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 / 赵红英, 宁一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9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 林其铨主编)

ISBN 978-7-5608-5302-4

I. ①五… II. ①赵…②宁… III. ①华侨组织—研究—世界 IV. ①D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140 号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 编 林其铨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

赵红英 宁一 著

责任编辑 季 慧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97 000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302-4

定 价 44.00 元

总 序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说,自1989年4月在福建省漳州市“纪念吴本诞辰10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论文中提出,迄今已有24个春秋了。在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研究和开拓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公开出版专著、文集九种:《五缘文化论》(林其铨著,1994年)、《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1997年)、《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林有成著,1997年)、《五缘文化力研究》(吕良弼主编,2002年)、《海峡两岸五缘论》(吕良弼主编,2003年)、《五缘文化概论》(林其铨、吕良弼主编,2003年)、《物缘文化研究》(林建华著,2004年)、《五缘文化:寻根与开拓》(林其铨主编,2010年)、《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王碧秀主编,2010年)。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还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五缘”研究成果选集》(2010年)。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数以千计。在实际应用领域,从最初对外开放的“三引进”(引资、引智、引管理)扩及侨务、两岸关系、社区建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经贸网络。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拓展,也催生五缘文化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出现:1993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率先成立“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1995年12月,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注册成立;1996年11月,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宣告成立;2009年10月,美国五缘文化协会(Five Yuan Culture Association in USA)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注册成立。由此可见,五缘文化说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阻隔,穿越政治和经济的界限,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缘文化说的提出,是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改



革开放实践成功经验的启迪和对引进西方管理与实际运行机制的文化环境的思考而产生的。所以,五缘文化研究是从实证性、应用性研究起步,初期侧重实践经验、历史资源的调查,从文化、经济互动的角度考察五缘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作用,论证五缘文化生存空间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也逐步从经验性、实证性向学理性、本原性的方向深化,从而由外在性的描述向精神内核、元典传承、古今转化、中外沟通等领域探索。五缘文化研究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具有边沿学科性质。五缘文化研究吸引了多学科众多学者,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介入,用不同学科的视野观照,因而大大丰富了五缘文化研究的内容。在众多学者经过 20 多年的辛勤耕耘下,五缘文化说已初具学理构架,然而作为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当说还有很大的理论空间,需要继续丰富、深化和完善。

自由与伦理出自人类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二重性,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自由,也不能没有伦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与伦理的和谐统一。但是,不同的民族各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为应对环境(自然的、社会的)的挑战,选择适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经验积淀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同样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因而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与西方相比,中华文化在观念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二是整合系统的思维方式和格物致知同体悟致智相结合的致知途径,以及观物取象、寓意于象、连类比物、切类指事的表达方式;三是以人为本追求有序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些核心理念体现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上,便是群体本位、伦理中心,从初民的自然人伦进而宗法五伦,再到五缘,发展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境界,表现形态随历史发展而有变化,但核心理念却稳定贯穿始终。

中华民族以远古的华夏族为骨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像滚

雪球似地吸纳诸多民族参与自然形成了多元一体、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文化代代相传持续了7000余年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这是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所仅有的。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多灾多难,遭遇过种种危机,但凭借自身的勇敢和智慧,最终都能战胜灾难、克服危机,得到更加壮大的发展。这证明她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值得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认真思考和求索。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提出了“精神地质形态”说。他认为精神文化从远古到现代,犹如地质学的积层,由今溯古可以看到:“好比松散的冲积层,完全堆在浮面”;“往下去是青石,云石,一层一层的片形石,非常结实,抵抗力很强”;“再往下去是太古时代的花岗石,埋在地下不知多少深,那是全部结构的支柱,千百年的攻击力量无论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个岩层完全去掉”。又说:“每个民族的情形都是如此;只要把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和它现代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尽管有些次要的变化,民族的本质依然如故。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所以,“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4、355页)。丹纳所说的民族精神地质形态埋在最深层、成为“全部结构的支柱”的“花岗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产生于人类轴心文明时期(公元前600—1000年)的元典文化,或说是民族的文化元、文化基因,这就是民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易传》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人认为其中蕴含的奋斗精神和兼容精神就是中华民族魂,时代再怎么变化,这种精神都具有永恒价值,这大概就是中华文化结构的重要支柱,也就是丹纳所说的埋在民族精神文化最深层的“花岗石”。

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传承中有其稳定性,但她存在的形态不是僵死不变的。民族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变化,犹如穿越时空滚滚向



前汹涌流动的河流,她浸润着经过的两岸大地心田,鲜活地呈现于历史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精英思想、典籍文化正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提炼、写照,但不可能囊括全部。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滋润着民族代代成员的心田,积淀为心理素质,成为行动的潜在指南。所以,真正的民族文化源头活水是不会干涸的,它与各个新历史阶段出现的新因素结合,化为富有生机的社会文化活水,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鲜活形态。就社会结构、人际网络发展中的“五缘”形态而言,它既是中华民族“群体本位”、“伦理中心”核心理念的外化,但又与时俱进,从原生封闭型到次生过渡型,再到再生融合型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不能用僵化的眼光看待它。五缘文化是基于人性即社会性和民族性自然形成的“王道”文化,而不是依靠强力而形成的“霸道”文化。社会资源潜藏于社会人际网络之中,五缘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人群起凝聚、调谐、纽带、桥梁作用,形成社会人际网络。因而五缘文化具有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双重品格。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只要摆正法、理、情的位置,同公权力加以区隔,五缘文化便能发挥其潜在的无穷正能量,描绘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成为实现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的一种形式。

五缘文化研究可以有两条进路:一是从历史典籍中找出源头活水,追源溯流、因枝振叶,撷取精华,探讨现实意义;二是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活水,再找活水源头,观澜溯流、振叶寻根,探索今古文化链接根据。《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可谓两路并进,既沿波讨源追寻五缘文化的文化根、心理源;又由隐及显,探索五缘文化在民俗、社团等载体的存在形式,及其现代功能与作用;诸因素的综合,由微观到宏观,最终转化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本丛书由此两重进路推进五缘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是初衷,而其宗旨是基于中西比较考察的背景,突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论题,力求通过学理性、时代性、实践性相结合的探索和研究,深化五缘文化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意蕴,拓展其实际应用的广度和效应,使五缘文化的推广和弘扬,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资源,融入



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素；进而探讨五缘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阐释其对跨文化沟通和全球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功能。

丛书五册，分别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展开。丛书各册的中心内容是：

第一册《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施炎平)，着眼于人际缘分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层面，梳理和概括出中华文化的“五”型思维模式，来探索五缘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流变，进而考察和总结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以为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资源。

第二册《五缘文化心理研究》(蒋杰)，应用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深层的文化分析与比较，在阐述“文化心理”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五缘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并探讨“五缘文化心理场基本结构及效应”发生的机制，以推进对五缘文化心理源问题的研究。

第三册《五缘民俗学》(郑土有)，以文化上的“缘”、“俗”之辩为契入点，探讨了五缘文化之“因缘生俗”、“由俗显缘”及“藉俗固缘”的民俗生态系统，力图建构一个五缘民俗学的体系框架。

第四册《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赵红英、宁一)立足历史和现实，对海外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因缘成链，落地成团，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过程及其功能变化特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索，力图展示多如繁星的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众生态。

第五册《五缘文化：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施忠连)着重论述缘分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哲学意义，揭示五缘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所造成的各种生态特征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展示它们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作用。作者强调作为大众文化的五缘文化民族软实力，其所显示的不同于西方概念的软实力，是中华文化独有优势所在，并且提出发展五缘文化应当成为中华复兴的民族战略。



各册作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介入,用不同的视野考量,内容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形成有机整体的学理构架。这是《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预设的本意,能否实现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应对环境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无论大小,各有其特色和长处,没有优、劣之分。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各民族间的距离拉近了,交流频率提高了,彼此的依赖度更强了,异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习、吸收、融合的机会更多了。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梦,因此民族主体要自觉,理论要自觉,文化也要自觉。我们既要摆脱百年来由于特殊的际遇而形成对西方文化体系的依傍,也绝不能妄自尊大、惟我独尊,重蹈西方霸权文化的老路,应该秉承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发展共赢,共圆世界梦。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的编纂是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自1995年成立以来又一项重大集体项目,课题研究和丛书出版得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及新加坡郑添文、许婉华夫妇和上海兰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盛晓萍、罗文耀伉俪的资助,同济大学出版社也给予很大支持,罗义俊教授带病参加了丛书的总审工作,责编季慧博士也付出了很多辛劳,此外还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林其饬

2013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总序

绪论	(1)
----------	-----

第一章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的形成及表现形式	(8)
-----------------------------	-----

第一节 五缘文化:华侨华人社团的结缘纽带	(8)
第二节 地缘性华侨华人社团	(12)
第三节 亲缘性华侨华人社团	(29)
第四节 神缘性华侨华人社团	(39)
第五节 业缘性华侨华人社团	(49)
第六节 物缘性华侨华人社团	(58)

第二章 30 多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新变化	(66)
-----------------------------	------

第一节 新移民数量增加,社会成分改变	(66)
第二节 整体实力增强,结构层次多元	(78)
第三节 参政热情高涨,融入意识提高	(86)
第四节 文化传承更加自觉,传播途径更加丰富	(93)

第三章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100)
-----------------------------	-------

第一节 社团自身的新变化	(100)
第二节 与住在国关系:加快属地化进程	(125)
第三节 与祖(籍)国关系:与时俱进产生新互动	(138)

第四章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前景展望	(148)
-------------------------	-------

第一节 复合性、整合化发展趋势加快	(148)
第二节 五缘文化的接缘、续缘将扩大和强化	(154)
第三节 促进文化与经济综合发展的作用将更突出	(159)



结论	(164)
主要参考文献	(167)
附录一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一览表	(171)
附录二 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世界性活动一览表	(196)



绪 论

华侨华人社团与华文报纸、华文学校并称为传统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其中华侨华人社团无疑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也是我们考察和分析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最主要的依据和参照。

自17世纪东南亚地区早期华侨社团的产生至今,华侨华人社团已伴随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走过了300多年的历程。^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华侨华人社团获得了长足发展。数量上,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有关统计资料,截至2000年,在54个国家中华侨华人社团总数达23000多个;^②分布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华侨华人聚居之处,可以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社团。功能上,各类华侨华人社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慈善、宗教等方面,服务于华侨华人社会日趋多元的需求。组织上,社团组织形式更加多样,综合性华侨华人社团更为普遍,联合性、洲际性、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出现了适应网络时代的一些新变化。此外,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华侨华人社团联系都更趋紧密,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调整、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华侨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联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和多元。

华侨华人社团的演变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性?哪些因素在华侨华人社团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两个问题,对观察当下及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在17世纪的日本、马六甲等地陆续出现的一些华人寺庙,一般被认为是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雏形。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发现,学者们将最早公开正式成立的华侨华人社团,向前推至17世纪末。见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庄国土、清水纯、潘宏立等:《近30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华侨华人社团数量,鉴于各国社团管理制度的差异性以及社团组织自身消长的特性,很难做到精确统计。目前对此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不同的方式推测出的数据差距也比较大。有的说1万多个(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王望波、庄国土:《2009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培训的教材分述了54个国家的侨情,数据截至2000年,将其中提到的各国华侨华人社团数量相加得23000多个(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一、华侨华人社团建设的三个层次

华侨华人社会数百年来的变迁,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逐步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之中。虽然这种转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快或慢,或平顺或曲折,甚至还有中断或反复,但总体而言,由最初独成一体的移民社会将向最终融为一体的本土社会转变这一大趋势已成公论。

在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下,华侨华人社团作为其中重要的社会组织、联系纽带和结社形式,其演变自然也相应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按照华侨华人社团功能上的不同侧重,以本地化程度由低到高为标准,用三个层次来加以概括,分别是:守望互助、争取平权、融入主流。一般而言,无论是各地华侨华人社团群体,还是单个华侨华人社团,其演变大致都以这样的趋势发展:早期社团以守望相助、弥合分歧、共谋生存为基本目的,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的立足生根,社团的宗旨开始出现为争取华侨华人同其他族裔享有平等权利等目标,再往后发展,华侨华人社团的宗旨目标和组织结构均更加开放,最终以当地社会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型态出现。

对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径,有几点需要说明:

(1) 不同层次的社团功能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而仅仅是华侨华人社会本地化程度差异在社团组织功能上的一种反映。这三个层次的社团功能都是华侨华人社会所需要的。就算是不断走向本土化的华人社会,也同样需要守望互助和争取平权功能的社团。

(2) 作为群体的华侨华人社团和作为个体的华侨华人社团,其发展历程是有差别的。某一地的华侨华人社团群体,从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看,其由守望互助向争取平权,再向融入主流的递进是个大趋势;但作为单个的华侨华人社团,其个体发展的历史也许会由以守望互助逐步发展到以融入主流为宗旨,但也有许多的社团长时间维持在某一个功能层次上,并不再向前发展,这是由华侨华人及社会的需求所决定,也是很正常的。

(3) 华侨华人社团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但绝非整齐划一,也不完全是单向性的。横向来看,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社团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状态;纵向来看,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干预,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历程也不尽相同,曲折或反复均有可能出现。因此,对华侨华人社团进行研究时,在概括其规律性的同时,应当充分注意其多样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点,避免以偏概全的情况。

二、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三项要素

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华侨华人社团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受着许多因



素的作用,正是在这诸多因素共同合力的作用下,走出了上述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轨迹。我们考察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影响其发展的种种因素,特别是那些作用特别关键、影响特别深远的因素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影响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一个是政治。结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利,尽管华侨华人社团更多的只是为了解决族群内部的互助问题,但人的集合势必会衍生出与权力相关的问题,也就带来了政治领域的诉求,也正因此,政治成为影响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一大因素。政治因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住在国政治因素。其一为住在国对民众结社的政策。这与住在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度有关,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度越高,社团发展的状况往往会越蓬勃,反之则萧条。其二为住在国对华侨华人的政策。这与住在国民族问题解决的程度有关,不仅涉及住在国对所有外来移民的政策,更涉及住在国对华侨华人这一个别群体的特殊政策,这是对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影响最为直接的因素,政策取向是吸引或排斥、政策制定的公平或歧视、政策执行的宽松或严格,常常会直接影响到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数量、类别、分布和活跃程度。

(2) 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其一为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从明清之际到今天,中国对华侨华人的政策大抵经历了限制反对、漠视不理、吸引利用、力图保护、保护涵养等若干阶段,每个阶段的政策取向不同,使得中国同华侨华人的关系出现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分期,由此也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带来影响,这主要反映在华侨华人社团与中国的关系上。其二为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关心、关注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对华侨华人社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如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社会就成立了大量支持中国革命和民族独立的社团,而在中国国内政治存在严重分歧的时期,如晚清时期保皇派与维新派之争、20世纪中期以后的国共对立,也对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 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因素主要涉及住在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局势。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友好或仇视,和平相处或兵戎相见,都会对相关国家内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显而易见,友好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有利于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仇视与战争的国际关系则破坏、打乱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进程。

影响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个是经济。经济的重要性不必赘言,经济因素作为一种实打实的物质力量,对于社会组织形态的华侨华人社团而言,其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强弱。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观察的角度,一个是从华侨华人群体总体上看,经济实力的强弱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另一个则是从华侨华人群体内部的角度看,经济实力的分化对华侨华人中不同社团的影响。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实力的强弱与华侨华人社团的蓬勃与否基本上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由于其他诸多变量的影响显得比较复杂;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华侨华人群体内部经济状况的分化对他们组建和参与社团的类型、宗旨和生活方式也存在明显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工商业主成立的商会和经济实力较弱的工商业从业人员成立的公会。

(2) 华侨华人经贸网络的疏密和经济活动的频度。经贸网络越密集,经济活动频度越高,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就越多越快,从而使得人际间的交往也越频繁,社团组建的需求也会越强烈,社团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反之则反。

(3) 华侨华人社团自身经济状况。社团自身的经济状况是社团赖以生存重要的基础,经费的筹措、管理和使用,是华侨华人社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以说,自身经济状况越好,包括经费数量越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越高、使用的效果越好,这样的华侨华人社团其作用也就发挥得更好,影响力会更大,存续的时间也会更长,反之则成为华侨华人社团生存发展最大的困难。

影响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个是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不同,文化因素更多的内化于华侨华人的精神世界,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对华侨华人社团而言,文化因素决定着组建社团的意愿强弱,社团组建的方式,社团的组织架构,社团内部的凝聚力以及运转机制等。文化因素可分以下三种:

(1) 中华文化因素。中华文化是华侨华人最为显著的文化印记,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最大最广也最深。中华文化对于华侨华人的认祖归宗意识和价值认同的形成,对华侨华人社会秩序的规范,人际关系的调整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则是华侨本人热衷创造社团组织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也可以说,华侨华人社团自始至终都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演进。

(2) 住在国文化因素。华侨华人与其他族裔人相比,中华文化是他们的特色,而与中国本土生活的人相比,其侨居异国而受到的文化影响则是他们的特色。华侨华人社团也如此,它既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无疑也受到住在国文化的影响,但这两种文化的影响各占据多少的比例,则会因不同的华侨华人群体而不同,但不管多



少,住在国文化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3) 华侨华人文化。所谓华侨华人文化,并不是将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简单地叠加,应当看到,华侨华人带着中华文化的种子和元素,播种和传承在异国他乡的环境中,中华文化中的一些方面会被放大和强调,另一些方面会主动或被迫做出调整和改造,从而产生一些有别于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的文化现象,这种生长出的文化果实被称为华侨华人文化,也会对社团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影响华侨华人社团的演变的上述三大因素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有人说,人既是文化的主人,也是文化的囚徒。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心理体验中形成的文化认同,是一种支配、凝聚人们行动的巨大潜在力量,也是民族形成与发展最重要的内聚力。^① 文化虽并无政治、经济等因素那样直接和有力,但它在华侨华人社团演变中的作用面之广、作用力之深、持久性之强,是我们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时应当高度关注的。

三、以五缘文化的视野,考察华侨华人社团的变迁



1980年代,由林其铨教授提出的五缘文化学说,是从文化角度分析研究地域间中国人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概括,也是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的一种视角。五缘文化学说认为,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国联系的文化深层因素,是以宗族亲戚关系为主的“亲缘”,以邻里同乡关系为主的“地缘”,以宗教信仰为主的“神缘”,以同业同学关系为主的“业缘”和以物为媒介的“物缘”这五大社会关系,简称“五缘”。^② 从1989年“五缘文化”概念的提出到现在,经过20多年的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已从对五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简要概括,发展为内容更为全面的理论体系;已从带有对推动两岸关系、引进侨资发展经济、改进侨务方针政策建议的政策性研究,发展为注重梳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轨迹、探索华人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变迁规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理论研究;已从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总结发展为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课题。可以说,五缘文化学说具有了更强的解释力。近年来,五缘文化学说在侨务工作、对台工作、经贸工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被社会普遍认可,展现其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随着五缘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其理论内涵在不断深化,研究的对象也在不断拓展。就其内涵而言,首先,五缘文化是对中华民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

① 林其铨、吕良弼:《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② 林其铨:《五缘文化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的一种理论概括。五缘文化学说从一开始提出就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中国人是“差序格局”中一圈圈波纹的波心,西方人则是一捆捆柴中某一根。^①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心理风习重情谊,基于义务、责任和奉献,具有“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整合的思维方式、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三大特点,^②五缘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人际关系结构和网络的特点进行提炼而得出的,当然也就同样具备中华文化的这些特征。

其次,五缘文化是对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新概括。之所以说它“新”,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观念既有上古时期的“六亲”和睦,也有西周以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关系,而五缘文化则将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人(海外侨胞)人际关系变迁产生的一些新观念结构囊括其中,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包括了血亲、姻亲和假亲(结拜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亦即通俗所说的大同乡、小同乡;所谓神缘,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关系,如居士林、道友、教友;所谓业缘,就是同学和同行关系,如同学会、校友会、行帮、商帮;所谓物缘,就是以物为媒介,实质是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关系。^③

再次,五缘文化学说是中华民族在流动迁徙、开拓创业、适应涵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特征的概括。从这一点上看,是五缘文化学说有别于其他类似人际关系理论较为突出的不同。五缘文化学说特别重视“动态”的中华民族人间际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数次大规模的移民,从中原走向沿海沿边,又经过移民和再移民,从本土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形成了“有海水到的地方就有华侨”、“有人生活的地方便有华人”的景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由此具备了强大的应付环境挑战的应变能力、涵化能力和适应能力,“五缘”关系便是中华民族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艰苦卓绝、相濡以沫的逃难、迁徙、创业、生存过程中不断强化、内化而形成。

第四,五缘文化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制度行为文化形态中的一种。按照文化形态学三分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表层文化,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行为文化又被称

① 这种比喻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② 林其铨:《五缘文化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③ 林其铨:《五缘文化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